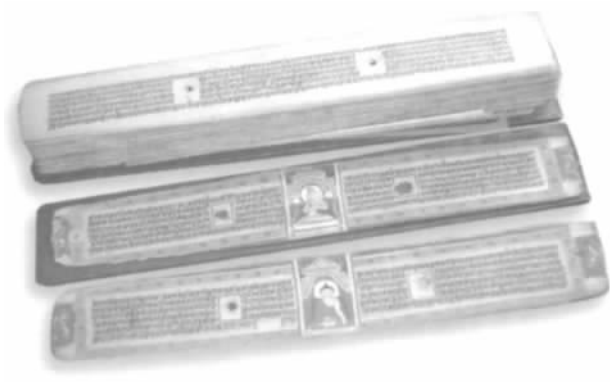


论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 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周 拉

公元8世纪末,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论师莲花戒来到吐蕃,与摩诃衍进行辩论。辩论结束后,根据吐蕃佛教的特点,撰写《修习次第论》三篇。这部论典成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思想及修习次第理论之纲领性论著,它改变了吐蕃佛教思想的混乱局面,统一了吐蕃佛教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指明了吐蕃佛教的发展方向。这部论典在藏传佛教思想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问世的历史背景

吐蕃第三十八代赞普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期,从印度和汉地引进佛教,即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和汉地禅宗两大宗派系统同时在吐蕃传播、推进。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创立人寂护在吐蕃传播其思想,建立寺庙,翻译佛经,传授弟子,成为印度佛教在吐蕃的领军人物。寂护圆寂之后,以摩诃衍为首的汉地禅宗在吐蕃迅速发展,蔚成风气,桑耶寺的大多数僧众以及皇后没卢氏等皆随从摩诃衍修习禅宗,它的覆盖面及信众等一时超过印度佛教一方。两派的教义思想本来大相径庭,加之信众人数的悬殊,势必发生对峙。最后,两派间的争执达到不可调和的境地。此

时,吐蕃名僧益希旺波向赞普赤松德赞提起寂护生前的遗言,请求遣人召请寂护的弟子莲花戒入藏,与摩诃衍进行辩论的方式来解决这一纷争。赤松德赞采纳了益希旺波的建议,通过辩论来决定两家在吐蕃的去留问题,获胜者允许留在吐蕃传播其教法,失败者则必须退出吐蕃。学界一般认为“吐蕃僧诤”的时间是公元792—794年之间。两家在藏王赤松德赞的主持下进行辩论,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主辩者是莲花戒,汉地禅宗的主辩者是摩诃衍。这就是藏传佛教史上著名的“顿渐之争”,或曰“吐蕃僧诤”,亦称“桑耶法辩”。从藏文记载看,“顿渐之争”以摩诃衍的失败而告终。“顿渐之争”辩论结束后,赞普赤松德赞要求莲花戒将其思想观点及修习次第写成文字,开示吐蕃民众。如《拔协》记载:“赞普向亲教师莲花戒请求道:‘如今所译定的所谓一切法皆由闻思而无我(意为:一切法皆空)的佛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请大师写成文字’,大师便写了《第一修行次第》交给赞普。赞普看后,明白了意思,非常高兴,又说:‘如想集中其主要之点去修行,那么,应该如何去做?’大师又写了《第二修行次第》交给赞普。看了以后又问道:‘若照此修行,有何结果?’于是大师又写了《第三修行次第》。并在宣示修行

结果的同时,顺便批驳了和尚的错误观点。交给赞普后,赞普看了非常满意。莲花戒担心在所著本释中出现渐门派反对菩提萨埵的思想,便又著了经与论的释文《中观明经》进献赞普。”^[1]由此可知,莲花戒根据赞普赤松德赞的请求,先后三次分别撰写了《修习次第论》初篇、中篇、后篇,一一呈献赞普赤松德赞。约公元794年左右,莲花戒写完《修习次第论》之后,天竺堪布桥迦瓦玛及藏族译师僧智军两人由梵文翻译成藏文,现已收录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2]中。《修习次第论》三篇的问世,开创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的先河,整顿了吐蕃佛教理论体系和修持方式,也向吐蕃人介绍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

二、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理论渊源及思想特点

关于《修习次第论》三篇的理论渊源,无论从寂护及莲花戒的师徒传承上看,还是从见地及修行方法等理论架构上看,莲花戒继承了其导师寂护所开创的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思想。

(一)莲花戒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法嗣

印度大乘佛教最初形成的主要宗派是龙树创立的中观宗。龙树菩萨(约2—3世纪)在先前流行的各种大乘经典的基础上,建立更为系统、更为完整、更为深入的大乘思想体系。龙树菩萨及其弟子提婆(约2—3世纪)的思想,在中观史上被称为“无偏向的中观宗”,他们的论著被称为“无偏向之中观宗的论典”。那时的中观宗的思想是以龙树《中观根本颂》为依据,形成了统一的大乘宗派,没有分裂。到了公元5世纪末左右,由于佛护(约5—6世纪)和清辨(约490—570)两位论师对龙树中观思想的理解出现了分歧,分别建立自己的学说。佛护在其代表作《根本中观注》中把龙树的中观思想解释为“随应破”;清辨在其代表作《般若灯论》中反驳了佛护对龙树中观思想的理解,并将龙树的中观思想解释为“自立量”。到了公元7世纪,佛护的追随者月称著有《入中论》、《明句论》等中观论典,坚持认为佛护对龙树思想的认识和理解是正确的,并对清辨的思想提出了质疑。从佛护到月称及其

后嗣寂天一系,被称为中观应成派,而清辨及其追随者被称为中观自续派。到了公元8世纪,中观宗的一些学者非但没有完全否认瑜伽行的思想,反而将中观宗和唯识宗的思想熔于一炉,继而形成了瑜伽行中观自续派。这一派的开山鼻祖是寂护(705—790),其代表作有《中观庄严论》和《摄真实论》等。寂护本来出自中观自续派,但他不像他的先辈大德们那样否定瑜伽行派的“识有”观点。他从中观派的角度,将瑜伽行派的“识有境无”的观点与中观宗的“一切皆空”的观点糅和在一起。他认为,“识有境无”是认识“一切皆空”的起点,属于“俗谛”。但心(识)的实在性最终亦要否定,将要达到“一切皆空”的认识境界,这属于“真谛”。莲花戒是寂护的主要弟子,莲花戒曾为寂护的《摄真实论》作《摄真实论注》,为《中观庄严论》作《中观光明论》。另外,莲花戒还为法称的《正理一滴》作《正理一滴注》,为《稻秆经》作了注疏。寂护从吐蕃返回印度后,其追随者与摩诃衍的追随者在吐蕃形成两大宗派势力,两者势不两立、争辩不断。大约在公元791年,莲花戒被请到吐蕃,与摩诃衍进行辩论。莲花戒获得胜利后,为了继续传播瑜伽行中观派思想,为了整顿、统一吐蕃佛教思想,著有《修习次第》三篇及其总结性文章《瑜伽修习次第论》。寂护论师的著作《中观庄严论》、智藏论师的著作《中观二谛论》、莲花戒论师的著作《中观光明论》,这三部书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代表性著作,三部著作都与中观自续派开创人清辨的思想有继承、渊源关系。所以,土观·罗桑确吉尼玛言道:“(寂护)论师的《中观庄严论》、智藏论师的《中观二谛论》、莲花戒论师的《中观光明论》,这三者又称为东(方)自续派三大家。”^[3]通过藏传佛教许多论典中的这一总结,可知莲花戒继承了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衣钵。

(二)莲花戒继承了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法脉

中观宗是最先出现的印度大乘佛教宗派,约在公元2世纪,龙树菩萨以《大般若经》等为经典基础,以“性空”思想为理论根据,著有“中观六论”^[4]及《十二门论》等论典,创立了中观学说。龙树菩萨以“二谛”的辩

证思维,揭示其中道思想,如《中论》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龙树菩萨从真谛和假谛的辩证关系中阐释“中道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象都由因缘和合而产生、存在、变化、坏灭,这些事象的存在本身是一种相对的、依存的关系。在名言范围内,可安立形状、颜色、称谓、好坏等,但这些都是一种假设或假象。这种假借的概念或名相,就是世俗谛或假谛。从究竟意义上讲,一切事象都没有不变的、永恒的、实在的实体或自性。所以说,一切法皆无自性。这就是胜义谛或真谛。龙树以此“二谛”的辩证思维,阐释“法无自性,缘起性空”的道理,破除执着的边见,即“断见”和“常见”,提出了中道的概念。龙树又通过“八不”来破除边见,揭示“性空”,如《中论》云:“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龙树看来,生灭、常断、一异、来出等四对矛盾范畴包括了主体和客体的一切矛盾现象。从实体的角度讲,不生亦不灭;从运动方面看,不常不断;从本质方面看,不一不异;从时间方面看,不来不去。这些矛盾只是在世俗范畴内安立,若能破除这四对范畴,就能超越世俗的认识,通达空性真理。龙树还通过“四无生”来抉择、阐明“缘起”,如《中论》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认为众生执着诸法生于四种因,即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龙树通过观察并破除此四因,抉择诸法无生。另外,龙树从观察物质的本体的角度,抉择诸法不住;从观察果的角度,抉择诸法不灭。

到了公元五、六世纪,中观学说进入了中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中观宗内部发生分裂,出现了中观应成派和中观自续派。公元5世纪,中观宗论师佛护的著作《根本中观注》及公元7世纪月称的著作《明句论》、《入中论》等中认为,龙树的中观宗既不用因明比量的方式,又不需自立宗义,所以名叫“应成派”或“随应破派”。中观应成派开宗明义地提出诸法无自性、无自相。公元6世纪的中观宗论师清辨的著作《般若灯论》中认为,中观宗应以因明学的逻辑方式立宗,论证中观正见,驳斥余宗,这一派称“自续派”或

“自立量派”。中观自续派安立诸法有自性、有自相,认为在名言范畴内,一切法存在,并有自性、自相。无论是中观应成派,还是中观自续派,他们的哲学思想均建立在“空”的理论上,否认小乘佛教的实在论和唯识宗的观念论。

公元8—11世纪的中观宗被称为后期中观学派,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中观宗和唯识宗的思想熔于一炉,形成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此学派的创立者寂护的代表作《中观庄严论》梵文成书时间学术界尚无定考,其藏译本于公元8世纪末由吐蕃译师智军翻译,全文为偈颂体,共九十七颂,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根本经典。此派主张:在世俗意义上“外境无有,万法唯心”,在胜义谛或究竟意义上“心境俱无”。这样,将唯识宗的“唯心无境”思想和中观宗的“一切皆空”思想糅合在一起,形成了有机的思想体系。如《中观庄严论》中言道:“作为因果法,皆必是唯识,由自成立法,彼即住为识。”这里说,所谓因及果等一切法,皆依识而非离识,心识明而体验一切事象,故说一切外境之法住于识。寂护认为,在世俗范畴中,以唯识思想安立一切概念,并观待一切事象。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独特的二谛概念,即“依于唯心已,当知外无实,依于此理已,知彼亦无我。”意思是说,在世俗范畴内显现的一切外境事象,皆依心识而存在,并非实际存在其自性。若以“离一多因”^[5]来考察、分析,将会发现在究竟意义上彼心识亦无自性,离一切戏论。在世俗范畴里,外境一切法住于识,认为“识”有,这是唯识思想;在胜义究竟意义上,外境及心识皆无自性,认为“心境俱无”,这是中观思想。这就是寂护大师的二谛思想。寂护大师又言:“乘二理妙车,紧握理辔索,彼等名符实,大乘之行者。”^[6]这是说,唯有乘着世俗唯识和胜义中观二理妙车,并紧握辔索即住伺察二谛之正理,始能获证真实义,也能获得真正大乘佛教之名。也就是说,通过唯识和胜义中观的融合,以“离一多因”等正理来伺察、考量二谛之别,方能现证真实义,这就是大乘佛教。这是在《中观庄严论》中提出的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思想的高度概括。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中讲“毗钵

舍那”部分的时候,显而易见,直接继承了寂护《中观庄严论》中的思想。莲花戒首先引用了《楞伽经》中的话:“微尘分析事,不起色分别,唯心所安立,恶见者不信。”^[7]《修习次第论·后篇》对此解释说:“应如是观:心性从无始以来,耽著于色等非正法故,犹如梦中显现所缘之色法等,诸愚者见色法等显现为外境。是故,此三界唯心矣。彼如是了知一切安立之法唯有识,若于彼分别寻思,即是思择一切法之自性。分别思惟心性,彼当如是伺察:胜义上,心识亦非生,犹如魔幻。若时,色法等虚假体性,执为实相,心性所现诸行相时,除彼外别无实有故,如同色法等虚假,彼岂能安立?如是色等诸行相故,自性非一亦非多。如是,彼心亦非另有故,自性非一亦非多。心识生起时无从来处,心识断灭时亦无去处。胜义上非自生、非他生、亦非共生。如是故,心识亦如魔幻。如同心识,一切法皆是魔幻。应观一切法实无生。”^[8]这段话的意思和《中观庄严论》的思想如出一辙,认为世俗范畴内“三界唯识”,在胜义究竟意义上“心境俱无”。由此可见,莲花戒直接继承了寂护的思想,属于瑜伽行中观自续派。

在《修习次第论》中融合了以无著《现观庄严论》为主要经典的“广大行”和以龙树“中观六论”等为主要渊源的“甚深见”两大传承。莲花戒始终站在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立场上,系统完整地论述了慈悲心、菩提心、方便及智慧等逐次修行的理论,并与摩诃衍针锋相对地强调了“菩提心”、“修行方便”、“妙观察智慧”等的作用和功能。莲花戒的根本观点是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在修行实践上摄收了瑜伽宗的修习次第。莲花戒修习次第理论之所以不像阿底峡的修道次第理论,因为莲花戒的《修习次第论》是为具备大乘根器者或欲入大乘行门者而撰写,只详细介绍了大乘佛教菩萨精神及修行次第,而没有涉及到“下士道”及“中士道”的内容。

三、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的主要内容

莲花戒名著《修习次第论》,从形式上分为初、中、后三篇。在《修习次第论·初篇》中描绘了大乘佛教修

习次第理论的轮廓,即大乘佛教的根本因素——悲心及菩提;修行内容——六波罗蜜及四摄;修行之果位——十地及佛地等的重要概念、基本知识。最重要的是,莲花戒把这些内容串在一条线上,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修习次第论》中既有佛教深邃的理论思想,也有佛教清净的修习次第,其重点介绍了从发起悲心及菩提心到修行六波罗蜜及四摄,再修习奢摩他、毗钵舍那,依次通过五道十地,最后获得一切智的方法、途径。《修习次第论》三篇都有不同程度的论述修习奢摩他、毗钵舍那的功德、内容、次第等,《中篇》中更为详细地阐述了奢摩他、毗钵舍那的概念、修习次第及奢摩他与毗钵舍那双运等。《修习次第论·后篇》也讲述了悲心、菩提心、奢摩他、毗钵舍那等内容,但其重点放在对摩诃衍的评判上。莲花戒来到吐蕃著书立说的主要原因,就是与摩诃衍进行辩论,传播瑜伽行中观自续派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前两篇中详细介绍了修行次第及修行内容的重点后,在后篇中评判摩诃衍提倡的“顿悟”及“无思、无观”的论说。

《修习次第论》三篇虽然各有重点,但若三篇整合起来看,《修习次第论》三篇之间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思想上的连贯性,三篇内容既自成体系、一脉相承,又独立成篇、各具特色,可谓一体三翼,可谓是一部藏传佛教前弘期义理思想及修持方法的代表性论典。其思想体系概括起来讲:以菩提心为大乘佛教的根本前提或划分大乘和小乘的界线,提出欲入大乘者须具足悲心及菩提心;具足悲心及菩提心的前提条件下,修闻慧、思慧、修慧等三慧;方便与智慧双运,方便是指修行布施等波罗蜜及四摄,智慧由修行奢摩他与毗钵舍那而获得;经过奢摩他与毗钵舍那双运、智悲双运,积累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逐次经过“五道十地”的菩萨道,最终方可获证一切智。

四、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与藏传佛教

后弘期修道次第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

公元8世纪末,莲花戒著作《修习次第论》以“悲

心”、“菩提心”为切入点,方便、智慧双运为主题思想,一切智为最终目标,建立其独特的修习次第理论。这就给吐蕃民众开示了修行佛法的次第,介绍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确定了藏传佛教显教的发展方向。公元10世纪,印度名僧阿底峡以“三士道”为理论框架,从小乘到大乘的一切内容为修行内容,以方便与智慧的双运为重点内容,以获证无住涅槃为最终目标,创立其修道次第理论,这就给藏族人重新开示了修行佛法的次第,也整顿了公元10—11世纪藏传佛教义理思想及修行方法混乱的局面,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宗派修道次第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认为,两者最大的区别在“三士道”的理论框架方面。莲花戒《修习次第论》开宗明义地提出,本论是大乘佛教的修道次第。如《修习次第论·初篇》之开头言道:“向文殊童子敬礼!大乘佛教诸经,为初修者开示,关于修行之次第,在此简略述之。”由此可见,本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就是大乘佛教修习次第。阿底峡开门见山提出了“三士道”的理论框架,如《菩提道灯论》的开头就说:“敬礼文殊师利菩萨!敬礼三世一切佛、教法以及诸僧众,贤徒菩提光劝请,故当善显觉道灯。由下中及上,应知有三士,为明彼特征,当书各差别。”关于“三士道”的理论框架,是根据众生的根性而建立起来的。从“三士道”各阶层的修行目标和思想动机上看,“三士道”理论涉及到小乘、大乘及金刚乘等一切乘。由此可以看出两者的不同点,莲花戒的修习次第理论主要讲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修行内容、修行过程等,阿底峡的“三士道”理论涉及到小乘、大乘各方面。

莲花戒论师的修习次第理论与阿底峡修道次第的内容联系上看,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逻辑关系。阿底峡尊者的“三士道”理论虽涉及到小乘、大乘等,但其重点放在“上士道”方面,上士就是指大乘菩萨。因为《菩提道灯论》重点讲述了大乘佛教的修行内容及过程,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论典以阿底峡《菩提道灯论》的理论框架为依据,系统地阐述了“三士道”的理论,更加深入地发挥了“上士道”的修行内容及过程等。上士道的内容与莲花戒的《修习次第

论》三篇中提到的大乘佛教的修行过程及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两者都提倡以慈悲心、菩提心为大乘佛教的根本前提,以方便与智慧双运为主要修行内容,以一切智为最终目标,两者都非常讲究修行的先后次第。班禅·洛桑确吉坚赞的名著《〈菩提道灯论〉释》中说:“于上士道者,从见地上看,有唯识和中观之分;从乘道上看,有显密之分;从道之速缓看,有牲畜之木车等,共分为五。上士道之内容,《毗卢遮那现证菩提经》云:‘秘密主,一切智者,从大悲根本生,从菩提心因生,以诸方便而至究竟。’正确无误的大乘之道摄于大悲、菩提心、布施等方便三者中,此义由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三篇中确定。”^[9]由此可见,上士道的修习内容与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见地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修习般若方面。莲花戒论师根据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观点讲“性空”,而阿底峡尊者以中观应成派的观点讲“性空”。除此之外,其他的修行内容及过程等两者如出一辙。

从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可知,莲花戒《修习次第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理论的影响更为突出。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引用莲花戒《修习次第论》文句及思想的地方约55处之多。尤其阐述奢摩他、毗钵舍那的时候,更多地引用了《修习次第论》的思想,阐述奢摩他部分中引用《修习次第论》约达32处,阐述毗钵舍那部分中引用《修习次第论》约达13处。宗喀巴大师还对莲花戒称赞道:“总之雪山聚中前弘圣教,谓圣静命及莲华生,建圣教轨。然由支那和尚堪布,解了空性未达扼要,以是因缘谤方便分,遮止一切作意思惟,损减教法,为莲华戒大阿闍黎善破灭已,决择胜者所有密意,为恩极重。于后宏圣教,则有一类妄自矜为善巧智者及瑜伽师,由其倒执相续部义,于教根本清净梵行,作大损害,为此善士善为破除。复能殄灭诸邪执著,弘盛增广无倒圣教,故其深恩普遍雪山一切众生。”^[10]由此,笔者认为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与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五、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

在藏传佛教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藏传佛教史上,印度僧人撰写的关于修道次第的主要论典有二,即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与阿底峡《菩提道灯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宗派皆以《菩提道灯论》中的“修道次第”为理论基础,建立了各自修道次第理论体系。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从而很多人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之理论渊源追溯到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很多。关于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的研究成果相对少一些,所以,很少有人关注藏传佛教前弘期关于“修道次第”的理论。莲花戒的《修习次第论》成书年代比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早三百年,此论作为藏传佛教前弘期关于“修道次第”的理论,对吐蕃佛教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虽然不象阿底峡《菩提道灯论》中的“三士道”思想那样,直接为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提供完整的理论,但它间接为藏传佛教后弘期诸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思想元素。因此,本研究认为,藏传佛教修习次第理论的肇始或起源是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

(一)莲花戒《修习次第论》是一部藏传佛教重要论典

《修习次第论》三篇是在“顿渐之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高僧莲花戒所著,且原文也以梵文撰写。据此,《修习次第论》这一论典的归属问题,即属于印度佛教论典还是属于藏传佛教论典的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或认识。本研究认为,虽然《修习次第论》三篇的作者背景具有特殊性,但它应视为藏传佛教论述修习次第理论的一部重要论典。从这部论典的历史背景看,公元9世纪末“顿渐之争”时期,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和汉地禅宗在吐蕃形成两股势力,互争高下、兴起争论,刚刚接受佛教的吐蕃民众对此认识不清、不知如何抉择,使吐蕃佛教处于困境。两者通过辩论,分晓

孰胜孰败之后,莲花戒受赞普之命,根据吐蕃佛教的特色和针对摩诃衍思想,撰写了《修习次第论》三篇。由于莲花戒不懂藏文,用梵文造了此论,吐蕃赞普立即下令译成藏文,公诸于众。从藏文译文看,语句通顺,用词准确、规范,与藏族学者的著作毫无二致,并其中引用的资料与原文完全一致。《修习次第论》的汉译情况看,宋朝时期《修习次第论·初篇》译成汉文,书名为《广释菩提心论》,汉译本分为四段,即广释菩提心论卷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其译者,在文本中写道是“西天译经三藏传法大师施护奉诏译”。据有关学者研究,施护为天竺人。此译文晦涩难懂,与藏文译文有出入。《修习次第论》三篇的藏文译文均存在藏文大藏经《丹珠尔》中,而梵文原文只剩初篇和后篇,中篇原文缺失。《修习次第论》三篇作为大乘佛教完整的修道次第理论在吐蕃传播的第一本专著,成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思想及修习次第理论之纲领性论著,开创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的先河,确定了藏传佛教的发展方向,也影响了藏传佛教后弘期各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

(二)《修习次第论》对藏传佛教后弘期修道次第理论的影响

“顿渐之争”结束后,吐蕃人以寂护的《中观庄严论》及莲花戒的《中观光明论》等为主要依据,视中观见为正见。还以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为经典依据,建立了修道次第理论体系。有鉴于此,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大师总结说:“关于前弘期的正见,初藏王赤松德赞时,曾首次向全藏宣布法律:凡诸见行,皆应依从静命堪布传规。和尚事后,王又重为宣布,谓今后正见,须依龙树菩萨之教,若有人从和尚之见者,定当惩罚。由此缘故,在前弘佛教时期,虽有少数唯识派宗见的班智达来藏,然主要的仍是静命堪布及莲花戒论师之风规。属于中观自续派见,此派较为发达。”^[1]由此可见,莲花戒《修习次第论》成为了吐蕃佛教的纲领性论著。到了藏传佛教后弘期,藏传佛教诸宗派接受阿底峡以来的中观应成派的观点。在修道次第理论方面,诸宗派也接受了阿底峡以来的“三

士道”的理论框架,建立各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体系。即使如此,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作为藏传佛教最早的修道次第理论,也对藏传佛教后弘期各宗派的修道次第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中反复引用《修习次第论》三篇的内容,尤其讲到奢摩他、毗钵舍那的时候,更多的引用了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修持方法。宗喀巴大师在讲到修习悲心的次第时言道:“如是于其等舍慈悲,别分其境。次第修者,是莲花戒论师随顺《阿毗达磨经》说,此极扼要。若不别分,初缘总修似生起时,各各思维,皆悉未生。若于各各皆生前说变意感觉,渐次增多,后缘总修随缘总别,清净生故。”^[12]可知,莲花戒在《修习次第论》中根据《阿毗达磨经》梳理了修习悲心的次第,即先修平等舍、次修慈心、后修悲心。莲花戒关于修习悲心、菩提心、奢摩他与毗钵舍那双运、智悲双运的学说,为宗喀巴大师《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逻辑严密、体系完整、内涵丰富的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元素。宗喀巴大师也对莲花戒的这一理论提出高度赞扬。另外,班禅·洛桑确吉坚赞的《〈菩提道灯论〉释》及章嘉若必多杰《宗教流派论》等格鲁派的许多论典中也反复引用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内容。藏传佛教萨迦派著名大师贡确龙珠的名著《道果法前行三现分庄严宝论》也引用了《修习次第论》的思想。另外,萨迦派著名显教大师荣敦·协夏贡热曾对《修习次第论》三篇分别作了详细的注释,这是迄今为止笔者所见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的惟一注释本。该著详细阐述了《修习次第论》的思想体系、理论特色,也论述了莲花戒与摩诃衍的思想分歧,简要介绍了莲花戒撰写《修习次第论》的历史背景。此足以说明,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学者们对莲花戒《修习次第论》的重视程度和《修习次第论》在萨迦派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中的重要位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修习次第论》三篇虽由印度瑜伽行中观自续派大师莲花戒撰写,但它应被视作一部藏传佛教的重要论典。因为,莲花戒针对吐蕃

佛教的情况,为了规范吐蕃佛教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奉藏王之命而撰写。《修习次第论》三篇的问世,结束了吐蕃佛教思想的分歧局面,统一了吐蕃佛教教义思想及修持方法,指出了吐蕃佛教的发展方向。从而,这部论典成为藏传佛教前弘期佛教思想及修持方法之纲领性论典。此论典既开创了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理论的先河,也为后弘期诸宗派修道次第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元素,使得藏传佛教前弘期与后弘期修道次第理论之间有了内在逻辑联系。由此可知,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在藏传佛教思想发展史上占有其他论典不可替代的作用。

【注 释】

[1]拔·赛囊著,佟锦华、黄布凡译注:《拔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在此译文中,佟锦华、黄布凡两位先生将《修习次第论》初篇、中篇、后篇,分别译作《第一修行次第》、《第二修行次第》、《第三修行次第》;莲花戒的另一名著“dbu ma snang ba”被译作《中观明经》,此论通行的译法是《中观光明论》。

[2]莲花戒:《修习次第论》三篇,载中华大藏经《丹珠尔》(中观卷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199页。

[3]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藏文原文见《土观宗派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藏文版,第25页。

[4]龙树的“中观六论”是:《中论》、《六十正理论》、《七十空性论》、《迴争论》、《细研论》、《宝鬘论》,也称“正理聚六论”。

[5]中观宗五大因之一,中观五大因:“破四句生因”、“破有无生因”、“金刚屑因”、“离一多性故”、“缘起因”。

[6]迷旁·降阳朗杰嘉措:《中观庄严论详解》,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藏文版,第13—14页。该书的前面部分抄录了《中观庄严论》原文偈颂体,汉文译引自索达吉堪布的翻译本。

[7]莲花戒:《修习次第论·后篇》,载中华大藏经《丹珠尔》(中观卷1),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大藏经》对勘局对勘、编辑,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此汉文译文

引自《大正藏·大乘入楞伽经》卷2,唐实叉难陀译,T.16n0672-p0596a19—20。

[8]同上,第182页。

[9]班禅·洛桑确吉坚赞:《〈菩提道灯论〉释》,载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教材《藏文文选》第八册,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10]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33页。《菩提道次第广论》藏文版,青海民

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11]土观·洛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土观宗派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藏文原文见《土观宗派源流》,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12]宗喀巴著、法尊译:《菩提道次第广论》,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菩提道次第广论》藏文版,青海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306—307页。

一诚会长赴港出席香港佛教界 庆祝佛诞公众假期实施十周年系列庆典活动

本刊讯 4月30日至5月3日,中国佛教协会一诚会长、陈文尧副秘书长等一行6人赴港出席香港佛教界庆祝佛诞公众假期实施十周年暨2009年佛诞节系列庆典活动。

一诚会长一行于4月30日下午抵达香港,西方寺住持宽运法师到机场迎接。当晚,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西方寺法主和尚永惺长老、住持宽运法师于如心酒店设素宴欢迎一诚会长一行。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觉醒法师及应邀参加佛诞吉祥文艺汇演晚会的上海玉佛禅寺梵乐团僧众一同出席了欢迎晚宴。

5月1日上午,西方寺隆重举行荃湾区佛诞节吉祥大会暨浴佛法会。一诚长老与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西方寺法主和尚永惺长老拈香主法,并与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永副局长等嘉宾共同剪彩。正在西方寺求受三坛大戒的近200名大陆戒子暨四众弟子千余人参加了庆典仪式。当晚,香港佛教联合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盛大的文艺汇演,通过清音梵呗、大型舞蹈、情景演出、歌唱表演等形式,礼赞佛陀,弘扬佛法。

5月2日下午,香港佛教界庆祝佛诞公众假期实施十周年暨佛历二五五三年(2009)佛诞节吉祥大会在红磡体育馆隆重举行,各界嘉宾、诸山长老、四众弟子近八千人出席庆典。庆典仪式上播放了《佛诞公众假期实施十周年》短片,一诚长老、觉光长老、香港民政事务局局长曾德成、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

公室主任高祀仁、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蒋坚永、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黎时媛、香港前律政司司长梁爱诗等主礼嘉宾启动开幕仪式,觉光长老宣读祈愿文,为香港抗击金融海啸及H1N1病毒祈福。觉光长老、曾德成先生、蒋坚永副局长、黎时媛居士先后致辞。觉光长老代表香港佛教联合会,将620多万元赈灾善款委托中联办高祀仁主任转交四川灾区,用于捐建阆中市四所受灾重建学校。

农历四月初八佛诞节被确定为公众假日,是香港佛教界三十多年努力的结果。香港回归前,佛教界虽向港英政府多年力争,始终没有结果;直到香港回归后,经觉光长老等香港佛教界大德奔走呼吁,受到中央领导的关注和社会各界的支持,香港佛教界发动社会各界人士联署动议,终于获得特区政府批准,佛诞节于1998年被确定为香港公众假日,并于1999年正式实施,迄今正好十周年。十年来,佛诞公众假日使香港社会大众加深了对佛法的认知和信仰,既凝聚了港人的社会力量,也坚定了港人的信心。为庆祝佛诞公众假期实施十周年,香港佛教界今年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包括5月1日般若吉祥诵经法会、佛诞吉祥文艺汇演晚会,5月2日佛诞吉祥座谈会“欢喜自在——缘来处处皆佛法”及佛诞节吉祥大会,5月3日华严忏行愿法会、万人皈依大典、传吉祥灯法会等。

5月3日,一诚会长一行结束在香港的活动返回内地。

(常 妙)